

于帮助公众端正认识是非常有益的。整体上说，这样的理论教育工作，理所当然是包含在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范畴里的。

在当前条件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出来讨论。这就是学风问题。多年以来，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和人文社科领域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党史学界的学风问题同样存在。所有市面上常见的形式主义、庸俗关系学、门户之分甚至炒冷饭、抄袭剽窃等等，也许一样不缺。其他不说了，关于学术研究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恐怕人们的认识或者动机也不尽一致。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是解决问题，这是过去从来不曾模糊的（学术异常情况不论），而现在则很少有人这么理解。常常看到有人晒出自己的文章之后，朋友们一片欢呼“哇，C刊！”就其本质而言，这是评价标准混乱之后人们心理失态的表现。不能责怪他们，特别是年轻人。他们面临着不合理不科学的考核的巨大压力和职称升等的沉重心理负担，不少人还处在“非升即走”的痛苦煎熬之中。道德说教解决不了问题。这是管理部门的责任，需要整个学术环境的根本改善。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党校教育看“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理差异及其调适*

郭 若 平

“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新立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长期发展的积极结果，也是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一个新的学科名称，就一般认知而言，这一名称应当是由党史和党建这两种侧重点不同的研究领域整合而成的学科概念。这样的整合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学科形成的内在规定性，恐怕还有待深入讨论。就以现有学科立名的既成事实而言，既然“中共党史党建学”已然成为国家整体学科体系中的独立门类，那么就有必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学科在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充分发挥这一新型学科的应有功能。长期以来，相较普通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党史和党建在党校教育系统中始终都是教学与科研的重头内容，都是作为主业主课而存在，课程设置相对稳定、系统。因而，从党校教育层面来探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视角。笔者长期在党校教育系统中供职，拟从职业经验出发，探讨应当如何看待“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地位和作用。

一、学科共识与现状

“中共党史党建学”正式立名之前，党史和党建在党校学科系统中分别被称为“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可是，这种称法在党校系统之外并未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它往往只是被视为一种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此处为讨论问题之便，依旧暂且将其分别称之为“学科”，因为这是各级党校教育系统中常见的命名或称呼现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学科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党史和党建在国家整体学科体系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并曾以“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党史·党建”等名义出现在诸多课题项目分类之中。显然，这种命名的语言符号形式——包括弧号与分隔号，已经显示党史和党建之间存在某种学理性的共性与差异。共性的特征较易理解，因为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分析领域，这是共同领域显示的同—性；差异的区分就较为复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概念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核心政治概念综合研究”（20ADJ008）的阶段性成果。

杂，这种差异在实际的学科机构设置上都有反映，不唯党校如此，高等院校也是如此。党校教育系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党史和党建的学科部门设置方面，早先是将党史和党建分别设置为不同的教研部门，这正是适应党史和党建学科建设不同取向的需求。但是，由于党史和党建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党史和党建学术界被不加区别地默认，并且以相关内容可以互为覆盖为理由，有意无意地认为党史和党建也可以相互替代。正是这种同一性认知，使得党史和党建尽管存在学科差异，但全国党校系统除去中央党校和少数省级党校之外，党史和党建大多被合并为一个教研部门。教研部门合并后的内部虽然存在教研取向上的分工，但并不妨碍人们默认党史和党建教研机构归类为一个学科部门是有理由的。

在各级党校教育系统中，党史和党建的学科部门无论合并与否，在日常学科观念里，都是将党史和党建看成是对党政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政治理论课程，区别仅在教学内容的差异，这是一个基本共识。实际上，在教学层面上，将党史和党建看成是政治理论课程，有其学科观念发展的前史。在中共理论教育史上，党史和党建就曾经以“政治科学”命名。将党史和党建一并看成是政治理论课程，在中共理论教育史上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早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在1933年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又称“苏维埃党校”）时，就将党史和党建设立为一门理论教育课程。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整顿党的作风》讲话后，中共中央随即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其中强调“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①。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所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党史研究重点是中共历史上的路线与政策，而不是研究中共历史的细枝末叶。也就是说，党史研究应当被看成是研究中共历史上重大理论问题的学科。历史地看，无论是党史还是党建，在学科发展史上都是纳入政治理论范畴而被人们所接受的。

在时下的党校教育系统中，党史和党建都是作为对各级党政干部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课程。201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其中规定“教学应当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业主课地位”，科研要“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②。按此规定，将党史和党建列为党校政治理论学科，完全符合党校办学的特色与需求。

二、不同层面的学科特征

尽管在党校教育系统中，党史和党建都隶属政治理论课程范畴，但党史和党建在党校的实际教学与科研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差异。当然，党史和党建的学科分殊早已存在。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的高级党校（取名“马列学院”），在课程安排上就单独设置“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共党史”。不久，中共中央又对各级党校教材作出规定，其中与“党的建设”相并列，专门列出“党的历史”教材。^③可见，不同的教材规定显然反映了党史和党建在学科内容上的不同。但是，在党校教育系统中，这种不同更多的是内容侧重点的差异。默认这种差异在此后的学科建设上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党史和党建在学科内容侧重点上的差异，无疑会导致相关学科制度安排的不同。目前在中央党校以及部分省级党校的学科部门设置中，党史和党建就被单列为不同的教学科研部门。这既是行政资源配置的问题，也是学科建构需要的问题。学科部门设置不同，教学取向亦随之不同。兹举笔者供职的党校两种教育类别所开课程为例，管窥党史和党建在学科取向方面的差异。

第一类是党政干部的各种理论培训，这是党校教育的教学主业。党史和党建的教学内容，一般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配合当下的政治形势或按要求开设理论宣讲的课程，如当前开设贯彻和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的课程，就是党校教育的头等任务。但是，能够体现学科差异的课程，主要体现在专业课程类的设置方面。党史和党建存在的课程设置差异，显示了学科内容侧重点、学科思维方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9—150页。

^②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第13、15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0、477页。

式、学科建构目的性等方面的区别。党史通常开设的是以史类论述课程居多,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中共党史重要人物评价问题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与经验”等;党建开设的则以理论分析课程居多,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执政党建设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党性修养”“全面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等。比照起来,两种讲授取向与要求显然各有分殊。

第二类是研究生培养,其中包括国民教育体系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党校在职研究生培养。党史专业性的课程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概要”等;党建专业性的课程则包括“党的建设学概论”“执政党建设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领导研究”“党的思想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党的组织建设与组织工作研究”等。显然,党建课程内容以基本理论为主,党史则以基本史事为主。理论运思与史事运思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无论内容讲授布局还是教学目的指向,都存在知识效果与容受要求上的差异。

从党校教育中党史和党建所开设的课程可以看出,党史课程的设计思路体现了内容上的纵向思维特征,而党建课程则体现为横向思维特征。这种思维特征导致课堂上的讲述方式呈现不同的教学模式,学员或学生的接受方式与思考方式也由此不同。教学内容取向的不同,在学科的内在学理机制上,就必然选择不同的知识构成方式。正因为存在知识构成的差异,使得党史和党建曾经被分立为两个学科及其学科部门。但是,长期以来,这两个分立的学科,又被人们视为一个统一体,无论在各种级别的课题设计还是在各种学术奖项的评审中,甚至在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党史和党建都在事实上被归类于同一学科而单独列出。这种被视为学科同一性的依据,就在于党史和党建研究的对象都是中国共产党,以至于两种存在差异的知识领域,因研究对象的同一性而被整合成一体,这或许就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被安置在法学门类之下并作为一个整体学科名称之所以成立的最根本理由。

三、学科整合带来的困难与机遇

人们往往将研究对象的性质,作为对学科性质进行定位或划分的依据,其实这是有问题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并不构成一门学科之所以成立的充分理由,因为同一个对象可以提供给不同学科共同研究,差别仅在于不同学科具有自身的学理特点。不同的学理特点,正是不同学科之所以不同的依据。党史和党建的共同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共产党,但二者研究的学理特点并不一致,以至于长期以来被当作两门不同的学科来看待,这种现象在各级党校教育系统中体现得最为普遍。

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已然正式成为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而作为既成事实的制度性规范的学科,在内容上涵纳了党史和党建两大知识领域,在价值上提升了党史和党建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整合而来的新兴学科,在党校教育系统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恐怕是在学科建制、教学理念、学术理路、业绩评估等方面。按照党校党政干部教育的实际需要以及教学内容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同一性,诸多省级党校早已将党史和党建合并为一个教研部门。在同一部门中,党史和党建的教学尽管略有分工,但实际情况是,党建教学内容更适合于满足党政机关党的建设工作的需要,因而课程比重较大,而党史教学的比重相对较小。即便尚未合并的省级党校,在整体教学计划分配上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近一段时间里,因“四史”教育的展开,这种情况略有改观。党史和党建在党校教育系统中的课程配置,往往是依据党政干部培训的实际需要程度而设置的,而现今“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整合一体化,使得这两类互为关联的知识系统,如何在学科建构中取得适当平衡,成为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

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学科部门建制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外在的,真正带来冲击的应当是影响学科内部融合的障碍。一门学科在教学领域和学术领域的功能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更多体现在学科的教育实施方面,而后者则更多体现在学科的学理探讨方面。党史和党建

之于党校的党政干部教育，都是以党的理论教育为教学目的，这似乎是党史和党建具有同一性之处。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同一性而遮蔽教学过程中的内容取向、讲论方式、教材编写、授课要求等方面的差异。这还仅仅是党史和党建在教学领域存在的融合困难，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在于学术研究领域的思考、分析和论述等方式存在的不一致。党史研究按照学术规范或惯例，当是取纵向历史思维方式为方法，而党建研究按照现有的通例，则是以横向理论分析方式为主要方法。显然，二者所形成的研究文本存在不同的论述形态。如何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框架内将二者结合贯通起来，在学科逻辑上又是一大难题。

尽管将党史和党建整合为一个学科范畴，在学科建设上遇到的难题当有种种，但这并不妨碍在一个学科范畴内，为党史和党建在教学与科研上互为交叉、互为发明、互为论证提供机遇。在党校党政干部的教育中，教学与科研能够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效的学科实践平台。只有通过实施教学与科研的具体实践，能够在学术经验上总结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这既是一个新的挑战性问题，也将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学术问题。

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现有框架内，党校的党政干部理论教育，可以在教学方式上有选择地融合党史和党建的相关学科知识。党史教学的讲堂传授特征，尽管在理论上应当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对党史某个专题知识进行传授，但因采用专题叙事的讲授形式，因而不可能在时空上完整地把握党史叙事过程，反而通常是以问题的组成部分进行分别论述，这恰恰为党史叙事连续性的处理提供了理论分析的空间与机会。理论分析适当地吸纳党建相关内容，反而有益于受业者深入理解党史的意义与价值，提高对党史某个专题问题的整体认识。

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党建教学，在按照惯常的对党的建设理论问题进行讲授的前提下，结合中共历史的相关史事细节，提供可资佐证的可靠史料进行理论论证，这样可以提高党建理论的分析说服力。这一教学过程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即党建理论讲授的学科对象，并不是针对某个单位或部门的具体党建工作如何展开而论的，而是针对中共有关党建工作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政策而论的。目下存在一些认知上的误区，简单地将具体党建工作分析当成党建研究的主体对象，以党建工作替代党建理论，以至于根本无法将党史融入其中，反而将党建理论当作一种对工作政策进行的分析或总结，甚而给出工作方案和执行措施的报告。显然，党史和党建在学科意义上的“融合”，并不是针对某种实际工作层面的“融合”，而是针对学科性质存在的共通性、同一性层面的“融合”，这需要有一个理论与方法调适的过程。

四、余论：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里谈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何以成立的理由，仅是从党校教育系统的角度而论的，越出这个业界范畴是否合适，恐怕要有另外的理由，以此试图引导学科建设的某种路径，恐怕也是不合适的做法。“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面对的毕竟是这个领域所有的研究机构和部门，因而它应当具备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规则与研究方法。党史和党建在理论意义上具有意识形态导向的功能，对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能够发挥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在政治思想教育层面上，党史和党建的教育功能无须强行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两个领域完全可以互为交叉、互为发明、互为论证、互为补充，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宣传教育效果。但在提高党史和党建研究的学术水准上，“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研究肌理不能不讲究，它的研究最终成果形态（论文或专著）的学术含量，不能不在学界普遍认可的科学范畴中被评估。教育行为与学术行为终究还是有差别的，因此讨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建设，以下几个相关学术理论问题似乎不应回避。其一，党史和党建在学科理路方面到底存在什么共通性与差异性？两个领域整合成为一个学科的学理基础是什么？其二，“中共党史党建学”既然是一个一级学科，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是否可能以这种一级学科的学科观念或思维方式进行学术思考？它的可能性依据又是什么？其三，如果以“融合”或“大党史”方式，将党史和党建整合为一个学科，是否可能冲击党史和党建两个学术领域各自的学术特色，尤其对党史的历史

学性质会带来何种学术上的增量或减量？其四，融合党史和党建为一个学科，在理论上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证明它的可能性，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上是否具备可操作性？人们是否可以写出一种严格的符合“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文本？其五，是否可以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范畴前提下，分别进行党史和党建的研究，在学理上各自为战，以此来避免学科融合带来的学理矛盾？其六，在承认跨学科合理性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分别建构党史和党建的学术理论？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又应当具有何种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色？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之所以值得思考，是因为可举一个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为证。譬如，某个党史类的学术期刊（党建类的学术期刊也一样），是否刊载党建类型的文章就成为问题，如不刊载，那么如何因应“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需要？如果刊载，那么，期刊的历史学专业性质就可能遭到质疑，甚至降低其中的史学意蕴的学术质量，如此学界可以接受吗？另外，是否可以进行创新性转化，发展出一种既体现党史特色又体现党建特色的学术类型的书写文本，来满足党史和党建被整合为一个学科范畴的需要？这个追问，可能是臆想也可能不是。假如有某个机构创办名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期刊，是否就有机会承载这种文本类型的文章呢？现实的学科问题需要给出科学的解释，这就有待来日“中共党史党建学”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的深入探索了。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

陈 峰

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中共党史研究独立为一级学科的设计正在逐步落地。党史研究是一个特殊学科，一方面与通行的学科体系不相匹配，一方面又处在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学科的交汇点上。党史研究独立之后该往何处去，如何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世所公认的学科？这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当然无力对此进行全面阐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史研究应当将学术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学术化打开了更大的空间，而学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学化、向历史学科靠拢。党史研究首先应当遵循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构筑自己的学科底线，借以清除和抗衡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第一步。历史学是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之路最重要的盟友，中共党史与历史学两大学科开展深度合作变得更加迫切而必要。基于此，笔者尝试就以往较少留意的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关系做一初步讨论。

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对话之旅正在开启。表面看来，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多少交集。二者在习惯上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长期以来，中共党史曾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而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则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下面的一个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鸿沟造成了二者的分野。尽管近年来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的呼声颇高，但“党史非史”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中共党史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基因。在很多场合，党史被作为党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来对待，承担着政治宣传功能，这种状况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由于研究理念、风格、规范及路径的一系列差异，从整体上说，党史界与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8ZDA169）的阶段性成果。